

【晚清卷】

章文欽 箋注

澳門詩詞箋注

珠海出版社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導言 晚清時代的澳門詩詞

一 引言

從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到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的七十餘年，構成中國歷史上的晚清時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災難深重的時代，西方列強的窺伺和侵略，清朝政府的腐敗和無能，使中國處在亡國滅種的邊緣。

鴉片戰爭後，葡萄牙緊步英國後塵，於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846～1849）間，強行在澳門實行殖民統治，並逐步侵佔澳門半島全部及氹仔、路環兩島。光緒十三年（1887），在英國的操縱下，葡萄牙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獲取“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這樣，體現中國對澳門主權的領土所有權和統治權被強行分割，澳門從明清時代葡萄牙在中國領土上的居留地，轉變成晚清時代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受到嚴重的侵害。在此期間，雖然有林則徐、鄧廷楨、張之洞和吳大澂等愛國的封疆大吏，順應士紳百姓的要求，採取一些補救的措施，仍然無法挽回大局。新寧趙天錫的《濠鏡》詩：“航海初來借一枝，卑棲安肯室堂窺。疆臣亦有深謀慮，大局瀾翻異昔時。”生動地概括了從明清時代到晚清時代澳門的歷史變遷。

本卷選入晚清時代五十九位詩人吟詠澳門的詩詞二百六十

九首，亦可視為這一時代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這些詩詞在時間上上承明清時代，下啟民國時代，其歷史文化內涵，亦可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中，獲得初步的了解。

二 作者及其時代

晚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其社會身份大約可分為官員、商賈、僧人、士紳、塾師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士紳和塾師。

自道光末年，澳葡當局驅逐駐紮澳門的香山縣丞和澳關委員，在澳門實行殖民統治以後，澳門很快成為清朝政令所不及的地方。與明清時代中國官員不斷巡視澳門形成鮮明對照，清朝官員的足跡已罕及澳門。晚清時代作為清朝官員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祇有張玉堂、陳徵文、尹恭保和易順鼎等數人，這裏值得一述的是陳徵文和尹恭保。

陳徵文字謹菴，福建長樂人。同治、光緒間宦粵垂五十年，負幹濟才，明敏善斷，屢薦卓異，而以巡檢微員終其身。官藁蕭然，而人不敢干以私。袍服時付質庫，乃暇則貰酒留賓，拈韻賦詩，自謂“生平所好，惟此一事”。謹菴大約於光緒七年（1881）在香山黃梁都巡檢任上曾至澳門，留下《蠓鏡雜詩》八首，多為吟詠澳地風物之作，第一首云：“竟許西夷受一塵，遂令聲教阻南天。可憐卧榻旁餘地，鼾睡他人四百年。”意謂葡人納租受塵，居留澳門，已令“天朝”的聲教在南方受阻。宋太祖尚曉得卧榻之利，不容他人鼾睡。明代以來的地方官府，居然在卧榻之側留下一片餘地，讓西洋“夷”人在此鼾睡了四百年。第八首云：“商情凋弊戍兵疲，殘局猶思

勉強持。須識聖朝柔遠意，不論強弱盡羈縻。”反映出在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瓜分慘禍逼在眉睫之際，清政府不但對西方列強毫無招架之功，連對貧弱疲憊的葡萄牙也無還手之力，祇能一概“羈縻”。在苦苦維護“天朝”尊嚴的字面背後，隱含着當時士大夫回天無力的沉痛。

尹恭保字仰衡，江蘇丹徒人。同治元年（1862）舉人。四上公車不第，改官粵東，見知於兩廣總督張之洞。中法越南之役起，受命監廣西軍，提督馮子材尤器異之。光緒十一年（1885）諒山之捷，出力頗多。後署雷州、韶州知府，頗有治績。仰衡大約於十三年（1887）隨廣東巡撫吳大澂查勘澳門望廈等村和附近各島，留下長詩《爭濠鏡》。時值中葡《通商和好條約》簽訂前夕，吳大澂之赴澳查勘，顯然為勘明澳界轉輾，採取補救措施。出巡時雖然牙旗組練，高艦艨艟，儀仗煊赫，但其時金甌殘缺，徒增憂憤，已無復明清時代巡視者的豪情。詩中云：“葡萄牙乃小國耳，垂涎此島謀居奇。上叩天關擬條約，夜郎自大忘其弱。比例旁擬英注黎，香港百年樓部落。……澳民喜睹使節至，火炬夜起陰陵中。吹蠡擊鼓訝生佛，是日海氣開鴻濛。嗟念蒼生駐桀戟，召彼象胥喻順逆。明時濠鏡本彈丸，況納金縢入賦籍。馳書辯摺聞於朝，猶界一隅止遠客。譬諸秦寺開牟尼，不使華民失阡陌。持是可以告職方，遠臣耿耿蘊籌策。”將這首詩與康熙間杜臻、吳興祚所作的同類詩篇相比較，可以看出時代已發生極大的變化。再將其與吳大澂本人在巡視後所上的奏摺相比較，又可以看出詩人的筆端，仍在極力維持這個江河日下的“天朝上國”的尊嚴，以及吳大澂這位補天乏術的“天朝大吏”的體面，可謂用心良苦。從而使其在抒寫誠摯愛國熱忱的同時，又殘留着幾分虛驕自大的氣味。

官員一旦去職，或遷徙流寓，或在籍鄉居，與已獲功名而未有官職者皆稱士紳。晚清士紳是一個龐雜而頗具影響的社會階層，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晚清士紳，大約又可以分為遷客寓公、愛國志士和香山籍士紳三類，下文分別舉其較為重要者。

遷客寓公之較為重要者，可推何紹基和張其淦。何紹基（1799～1874）字子貞，號東洲、援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提調，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咸豐二年（1852）任四川學政，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按等官，置承審官七人於法，閭閻稱快，而權貴側目，率以事落職。遂絕意仕進，日徜徉於佳山勝水之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平生曾三度至粵，同治二年（1863）至粵時，作澳門與香港之遊，留下長詩《乘火輪船遊澳門與香港作……》。鴉片戰爭以後，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士大夫要求了解世界之風日熾。有能作西洋之遊者，被視為空前壯舉。其未能遠渡重洋者，亦每借澳門與香港為海外之遊。子貞自云：“平生足跡遍行省，今日得此韻外遊。”其詩所詠及於西方蒸汽輪船、車輛儀器，以至格致之學，同文福音，視野開闊，可謂得風氣之先，從而在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歷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張其淦（1859～1946）字豫荃，廣東東莞人。光緒五年（1879）舉人。後入學海堂，遊於碩儒陳澧之門。十八年（1892）成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二年（1896）授山西黎城知縣。二十七年（1901），因教案以“保教不力”去職。歸籍任龍溪書院山長達七年。嗣因涉嫌案大白，遷安徽候補道。宣統二年（1910）改安徽提學使。辛亥後以遺老自居，隱於滬上，著述吟詠以終。

豫荃大約於歸籍後曾作澳門之遊，留下詩作二十六首。其《初到澳門，用陸放翁〈初到榮州〉韻》以賈誼遷長沙喻自己的澳門之行。其時報國無門，壯心已灰，祇能到這淪於異國統治的澳門暫寄萍蹤。“居夷不陋孔丘語，壯心欲泛張騫槎”之句，正是對澳門之行無可奈何的解嘲語。然逐臣遷客，浪迹天涯；家國憂患，身世羈愁；中年哀樂，蒼茫百感，祇有在澤畔行吟中時時排遣出來，以稍舒其胸中磊落抑塞之氣，因而在這首詩和其它詩作中留下許多“牢騷詩句”。

愛國志士之較為重要者，則推魏源、康有為和邱逢甲。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早歲遊幕江蘇，英人侵犯海疆，參與浙東抗英。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進士後，歷官東臺、興化知縣，高郵知州，政聲卓著。默深為近代著名思想家、學者、詩人，後世將其與林則徐、龔自珍合稱龔魏林。平生著述甚豐，而以介紹各國史地政情的《海國圖志》影響最大。

默深大約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作澳門與香港之遊，為增訂《海國圖志》搜集資料。遊澳後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詩中所詠的洋琴，即清代詩人屢有詠及的西洋風琴。詩的開頭描寫詩人乘着天風，遨遊四方，被吹送到充滿西洋情調的澳門。接着描寫白鴿巢園及園中的百鳥，由百鳥和鳴的自然界語言，轉入人類的音樂語言——庭園女主人美妙動人的風琴聲。進而描寫風琴的音樂效果，而以與澳門關係至為密切的大海，作為琴曲的主題。萬里遠航，關山阻隔，阻不住西洋人對祖國和親人的思念之情。當帆船乘着順利的風信返回澳門，整座城市都充滿着親人團聚的歡樂，百鳥彷彿在為此而啼叫，鮮花彷彿在為此而開放。樂聲時而急促亢奮，時而珠圓玉潤；或如風雨交加，或如響箭齊鳴。後來樂聲逐漸變輕，戛然

而止，宛如孤雁，劃破長空，海波不揚，萬籟無聲。詩人最後抒發感慨，感到中國人與西洋人雖然在地理上相距遙遠，卻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彼此的感情是可以溝通的。默深詩所詠雖僅及西洋風琴，然其澳門和香港之遊，時距鴉片戰爭不久，對《海國圖志》的撰寫有很大的幫助，從而在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的歷程中留下重要的印記。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門人稱南海先生。出生於以理學傳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早歲受業於名儒朱次琦，博通經史。後因廣東瀕臨海外，得風氣之先，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文化的影響，逐步形成維新變法的思想。光緒十六年（1890），在羊城設萬木草堂，授徒講學，培養維新人才。二十一年（1895），入京會試，適值中日《馬關條約》即將簽訂，聯合各省舉子一千多人上書光緒帝，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史稱“公車上書”。同年成進士，繼續在京組織強學會，在滬設立分會，推動各地設立學堂、報館，鼓吹變法維新。二十四年（1898），支持光緒帝發動百日維新，冀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實行全面改良。變法失敗，被迫流亡海外。晚年思想逐步落伍。

長素於光緒十三年（1887）秋遊香港和澳門，作《香港觀賽珍會閱歐戲，遂遊濠鏡觀馬戲，為見歐俗百戲之始》，詩云：“香江陸海感蒼茫，濠鏡山川對夕陽。若問先生果何見，詭奇馬戲及蠻裝。”詩人於光緒五年（1879）秋首次遊香港，受西方資本主義文物制度的影響，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這一次香港、澳門之行，使他又一次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對其維新變法思想的形成，顯然有着積極的影響。結合上文魏源、何紹基和下文邱逢甲等人的澳門和香港之行及詩作，說明沿至近代，澳門仍與香港並列，成為中國人瞭解世界、接

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窗口。

邱逢甲（1864～1912）字仙根，號蟄仙，廣東鎮平人，生於臺灣。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授工部主事。不樂仕途，告歸臺灣，授徒講學。甲午戰爭事起，組織臺灣義軍護臺抗日。清廷割棄臺灣，刺血上書，力爭無效，遂倡建臺灣民主國，唐景崧為總統，自任副總統兼大將軍。屢挫敵鋒，至援絕饑窮乃內渡，奉親歸鎮平故里。致力於教育，主講潮州韓山、東山等書院，創辦嶺東同文學堂於汕頭，以歐西新法教育青年。曾任廣東總教育會會長、廣東諮議局副議長。辛亥革命後，被推為廣東軍政府教育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旋病卒。

仙根早歲居臺即以詩名，數十年復顛頓於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餘，皆足以鍛鍊而淬礪之，其所為詩益蒼涼慷慨，復與易順鼎、陳三立、康有為、黃遵憲、潘飛聲諸人遊，造詣益深，詩格益高。他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赴南洋聯絡僑民，考察教育，道經澳門。留下《澳門有贈》和《澳門雜詩》十五首。其中《澳門雜詩》第一至三首諷刺明清官吏昏庸誤國，致令葡人佔據澳門。他在二十一年（1895）離臺內渡時，曾作詩痛斥投降派李鴻章賣國割地，斷送故國山河。這時來到同樣淪入異國統治的祖國領土澳門，首先在詩中鞭笞自蹙輿圖，將祖國江山拱手送人的庸俗官吏，是十分自然的。

同《明清卷》一樣，若以地域而言，在晚清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粵籍詩人仍佔極大的比例，尤其是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府屬縣份。其中譚瑩、簡朝亮和潘飛聲，與上文提及的康有為、邱逢甲，皆晚清時代嶺南乃至全國知名的詩人、學者，這裏限於篇幅而不一一列舉，僅以在明清時代為澳門所屬，在晚清、民國時代仍與澳門關係十

分密切的香山縣為例。載入本卷的香山籍詩人達十一人，超過本卷詩人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劉嘉謨、鄭觀應和楊應麟。

劉嘉謨（1777～1849 稍後）字簡在。貢生，官通政司經歷，居京師五載，旋奉母歸隱，晚歲僑寓羊城。性喜遊歷，復耽吟詠。粵中名輩張維屏、黃培芳、譚瑩及釋純謙、蔡顯原等皆為吟友。道光二十年（1840）春，林則徐繼虎門銷烟、巡閱澳門及斷絕英人貿易之後，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請將高廉道易中孚移駐澳門，又派素有賢令之譽的樂昌知縣吳思樹署香山縣事。簡在在羊城獲悉這一消息，遂欣然賦詩云：“聞道蓮花澳，紛然肆犬羊。元勳忠作膽，異類狡為腸。服豸旌方駐，飛鳥寫早光。新猷多雨露，草木遍春香。”對林則徐等的措施表示由衷的讚美和支持。從詩中可以看出當時粵中尤其是香山縣士紳、百姓，對林則徐這位近代中國偉大的愛國者的崇敬心情。

鄭觀應（1842～1922）字正翔，號陶齋。咸豐八年（1858）赴滬學賈。任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復自營貿易，投資輪船公司及礦業。以捐資得道員銜。歷任輪船招商局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總局、漢陽鐵廠及粵漢鐵路總辦等。

陶齋為近代中國愛國者及改良主義思想家。他於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赴香港交涉中國購買德國克虜伯大礮被扣事件，終將大礮二十五尊運回，支援抗法鬥爭。復冒酷暑赴西貢、曼谷和金邊等地偵察敵情。同年冬，因其抗法義舉招英人之嫉，被太古洋行藉口要其賠償所薦該行買辦虧欠四萬餘元，串同港英當局將其扣留，直至次年下半年始脫累歸里，在澳門鄭家大屋一住七年，寫成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

響的《盛世危言》。返澳之初，值鄭家大屋落成不久，作七絕《題澳門新居》二首。又審視當年澳門嚴酷的社會現實，作七古《澳門感事》，詩中以澳門本為中國領土，葡官在澳地包私庇匪、窩娼聚賭、勒收公鈔、凌虐華民之事頗有感慨，切責華官華民“自謂文明實昏瞶，不識公法受愚憊”。企圖通過《萬國公法》，向國際社會討還公道。其見識雖然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人，但在當年強權出公理、弱國無外交的國際社會，這種想法顯然是無法實現的。

楊應麟一名瑞初，字訓強，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分省試用同知，補用同知，不願為官，歸居舊里。所居下恭鎮北山鄉密邇澳門。宣統元年（1909）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因清廷與葡萄牙談判澳門劃界問題，返邑成立香山勘界維持會，任會長，堅決反對葡萄牙擴佔澳門以外的中國領土。復發起成立廣東勘界維持總會，任副會長。旋組織香山九十八鄉民團，反對澳葡在前山內河疏濬河道，越佔中國領海。瑞初為清末香山地方愛國紳士，在“風氣趨洋薄，邊聲近海饒”（梁喬漢《登西望洋山頂》）的年代，以桑梓密邇鏡湖，對歷年發生之事，感慨特深，遂作《鏡湖感事十詠》，以傳信史而抒懷抱。

在歐西新法教育尚未普及以前，中國的民間教育在晚清時代的澳門頗為流行，而塾師仍不失為當時較為貧寒的讀書人的一種謀生手段，因此有不少內地讀書人赴澳充當塾師，澳門詩的作者黃國培、楊增暉、梁鸞翔和梁喬漢便是其中的幾位，茲以黃國培和梁喬漢為例。

黃國培字煌業，號曼君，廣東香山人。增貢生，考授實錄館校對，議叙縣丞，歷官福建連城、甯德、長汀知縣。他大約於道光三十年（1850）秋，應澳門友人之請赴澳。其後寄寓普濟禪院，在其中設帳授徒，直到咸豐元年（1850）春。其時同

在澳中設帳授徒的還有蕭孝廉孟庚。

在澳期間，曼君留下有關澳門的詩作十餘首。《館於普濟禪院黎明僧送粥至》云：“天風吹我鏡江遊，乞得虛堂粥一甌。半世生涯千卷拙，五更殘夢一鐘愁。心隨楚些爭蘭芷，口向莊生應馬牛。欲把書齋榜鬱鬱，未知嫌見辱余否？”中國的寺院有與文人結緣的傳統，對落泊的寒士且有周濟之惠。普濟禪院數百年來亦保持這一傳統，這首詩便是一個例證。結聯二句意謂欲以“鬱鬱”（同鬱鬱，憂悶）二字作為齋名，書寫張貼於書齋之上，又恐被見嫌而將我侮辱。極為傳神地道出了一個寄居寺院的寒士的落泊心境。

梁喬漢（1851~?）字斗衡，廣東順德人。諸生。以饑驅至羊城等地設館授徒。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澳設館。以澳地濱臨海外，別成一島，人煙蒼萃，亦成都會。開闢之由來未盡湮沒。遂以公餘多暇，采摭舊聞，搜訪遺址，覽其方輿，考其風俗，倣宋方信孺《南海百詠》之意，作《鏡湖雜詠》五十首等，及香港雜事、雜感若干首，合刊為《港澳旅遊草》。《鏡湖雜詠》五十首包括古蹟名勝十五首、風土雜詠二十五首、夷俗雜詠十首，為吟詠澳門古蹟名勝、風土習俗的大型組詩。它產生於晚清時代，在澳門詩中上繼清初吳漁山的《罌中雜詠》三十首，下啟民初汪兆鏞的《澳門雜詩》七十二首。雖然詩中屢雜堪輿家言，詩學造詣亦不及吳、汪兩家。然斗衡以一鄉間塾師，吟詠風土，記述見聞，擅於寫實，頗有佳作。與吳、汪兩家之作，同具詩史之價值。在晚清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詩篇中，居於重要的地位。

此外，在晚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中，南海羅惹卿作詩五首，與同有才女之譽的民國時代洗玉清的詩作，可謂先後輝映。日本漢詩作者永井久一郎作詩三首，為目前所能見到的澳

門詩詞的惟一外國作者。

晚清時代屬於近代中國的前期，中國對外關係從古代型轉變為近代型。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後盾，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滲透，瓜分中國的慘禍逼在眉睫。中國詩人來到被葡萄牙強佔、強制推行殖民統治的澳門，往往將因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所發的感慨，和自身憂國傷時的情懷形諸吟詠。

中國詩人常常在揭露葡萄牙的殖民統治的同時，寄托自己的感慨。如道光末年蔡球《經澳門作》句云：“天開神禹甸，此盡尉佗疆。鬼市抽人稅，民脂奉虜糧。誰為班定遠，生縛左賢王。”詩人見到澳葡政府强行向華民抽稅，官府搜括民脂民膏，支付鴉片戰爭賠款，遂慨歎世無禦侮卻敵的英雄，使西人得以在中國的領土橫行。

關於澳葡當局强行抽稅的情形，鄭觀應《澳門感事》句云：“屋價千金抽八十，公鈔不納被官封。”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六首：“煙酒公司權稅添，行囊夾載罰加嚴。誰人作俑增苛政，權利從教彼族兼。”皆詠其事。

至於澳葡凌虐華民的暴行，楊應麟《鏡湖感事》第四首：“禾黍龍田恨故闌，楚人一炬竟燒秦。白頭野老吞聲哭，一樣中原有棄民。”描寫光緒三十三年（1907）澳葡增闢馬路，逼遷焚燬龍田村民居三十餘家，華民分離遷徙，慘不忍聞。而第七首：“莫愁誰更說盧家？人笠追豚試虎牙。牆有牆茨長不掃，蠻風吹墜女兒花。”則描寫葡人淫暴，強佔華人少女，致令羞憤含生。

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統治，引起中國詩人對明清時代澳門歷史的反省。明隆慶三年（1569）粵籍工科給事中陳吾德條陳借濠鏡與西洋事被一再詠及。潘鳴球《遊澳門有感陳給諫借濠

鏡與西洋事》句云：“此地雜華夷，前人貪獻貢。久假不我歸，勢漸致狂縱。……卓哉陳給諫，先事鑒已洞。利害悉指陳，字字有餘痛。朝議奈堅持，斥為愚且戇。禍患起忽微，履霜即冰凍。”陳璧光《澳門行》則云：“胡為借與夷，事後遺煩惱？一悞在前明，國柄日顛倒。豈無秉哲士，憂心怒如憤。萬里叩君門，孤忠持諫草。今已數百年，傳聞有故老。吁嗟陳給諫，片言關大造。”陳吾德條陳濠鏡事在粵中民間故老相傳數百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外患日亟，這一故事重新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潘鳴球和陳璧光的詩篇就是明證。

中國詩人來到澳門，目擊時艱，愴懷國事，悵觸無端，澳中景物引起的感慨和對家國憂患的縈念往往交集胸中，發而為詩。潘飛聲《濠鏡謁天后閣》下半云：“竟棄珠崖傷豎子，重扶銅柱定何年。手持神珰趨臺卜，祝降波臣莫海邊。”這首詩作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即中日甲午戰爭的第二年，“其時中國新敗，臺灣全島被割，給中國人以莫大刺激。詩人來到同樣淪入異國統治的中國領土澳門，深慨全甌殘缺，國土淪喪，世間祇有將祖國江山拱手送人的奸佞，何時纔能出現重扶銅柱，收拾金甌的英雄？詩人在媽祖神像前虔誠禱祝，祈請神靈派遣神將波臣保障海疆的安寧。”（拙稿《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澳門媽祖閣的考察》）

張其淦《慷慨》云：“慷慨悲歌欲問天，眼中人竟老林泉。心如老驥思邊塞，身似飛鴻寄海天。赤血千家悲馬革，黃圖三輔起狼煙。可憐萬里中華月，照到遼東月不圓。”這首詩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詩人在澳門聞東北日俄戰爭之事而作。日俄戰爭的戰場瀋陽為清代留都盛京所在地，故稱“黃圖三輔”；旅順口位於遼東半島南端，故稱“遼東”。全詩將家國之恨與身世之感，殺敵報國的理想與落拓天涯的現實形成鮮明

對照，語最沉痛。可與陸游《訴情衷》詞“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數句相匹。屬於同類的詩作還有《客思》：“孰是桃源境？都無安樂窩。側聞遼左戰，已見海揚波。閭里空泉布，乾坤有網羅。廟謨多勝算，惟用止干戈。”詩中以網羅喻當政者用來對付異己及百姓的嚴刑酷法。謂當政者若有安邦定國、克敵制勝的謀略，就應該用來抵禦外侮，平定列強侵略中國的戰爭。

箋注者在《明清卷·導言》中提到，生活在清代康乾盛世或乾嘉盛世的中國士大夫，多少帶有一種作為天朝上國子民的自豪感，時時將這種感情形諸吟詠。可謂“盛世人慣作豪語”。在清代的澳門詩中，便不乏這樣的盛世豪語。與此相反，晚清時代的中國詩人，處於國家民族危難之際，為詩多憂生念亂之作。他們所作的澳門詩，亦多憂國傷時，抒發對國家民族感情之什。可謂“衰世人多為悲歌”。如鍾兆霖作於光緒三年（1877）的《澳門渡海感賦》，下半云：“顧誰早具終軍志，弔古終憐陸賈才。如此繁華好風土，卻教夷虜起樓臺。”又《澳門》第四首下聯：“雲氣如輪東北去，微吟休作《大風歌》。”詩人借描寫澳門當年冬春之際東北風盛行季節的風沙，有感於當時國勢日蹙，山河淪喪，慨歎世無鎮守四方的猛士，像漢高祖劉邦那樣吟詠《大風歌》一類的詩篇，祇有徒增悲憤而已。與“顧誰早具終軍志，弔古終憐陸賈才”二句寄慨同深。

屬於同類詩作的，又如作於光緒十年（1884）的陳燮疇《澳門》下半：“窟藏蛇蝎污難滌，族混華夷患易留。獨抱私憂春且買，忘懷端賴酒盈甌。”結聯二句，反映了當時具有先進思想的士大夫憂國憂民而又無可奈何的心境。作於宣統二年（1910）的楊應麟《鏡湖感事》第一首：“海疆重鎮棄前明，一度胡笳一度驚。總是鯨魚吹浪起，至今江水未曾平。”這類衰

世悲歌，到民國時代還將繼續，並賦予新的歷史內涵。

三 作品內容

晚清時代的澳門詩詞，同明清時代一樣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其一，這些詩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晚清時代中國內地和澳門本地發生的歷史事件。如上文所引，劉嘉謨的詩反映了道光二十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尹泰保的詩反映了光緒十三年（1887）的中葡條約交涉；潘飛聲的詩反映了光緒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戰爭；張其淦的詩反映了光緒三十至三十一年（1904~1905）的日俄戰爭。還有許多詩作所反映的若干歷史事件，下文按年代先後加以論述。

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中國百姓沈志亮等刺殺葡督啞嗎嘞（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為晚清澳門史的一大事件。劉燾芬、鄭觀應、潘飛聲、邱逢甲和楊應麟皆有詩詠其事。啞嗎嘞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澳門總督，強行在澳門推行殖民統治，驅逐駐澳華官，強向華民徵稅，強佔華民田地。為了強佔三巴門至關閘之間的中國領土，開闢馬路，平毀沿途華民塚墓，棄滅骸骨，引起天怒人怨。沈志亮（又名米）與郭金堂等祖墓亦受其害，遂發謀設策，於七月初五日（8月22日）在關閘附近將啞嗎嘞殺死。兩廣總督徐廣縉害怕引起中外爭端，示意鄉紳鮑俊勸沈志亮出首，經審訊後，旋將沈處死，郭金堂遣戍。昔日前山寨西城下還有沈志亮墓，墓碑書“義勇沈公之墓”。

劉燾芬的長詩《沈義士歌·並序》，大約用詩人撰寫光緒《香山縣志·沈志亮傳》時所得的資料寫成，序文記述事件發生

的原因和經過，可與縣志《列傳》互相印證。詩末描寫沈志亮殺死啞嗎嘮後慷慨赴義的情形及人們對他的懷念：“胡兒控制府，制府心怦怦。義士挺身出，旁觀為目瞠。陳情不少飾，效死還相爭。千金饋老母，公道人心明。坐者為起立，聞者為趨行。萬口說義士，義士今猶生。義士幸不生，羣胡正驕猛。我嘗至其地，慨想忠魂馨。養癰者誰人，念之為涕零。”將這首詩及縣志《列傳》與事件發生時的中西文獻記載相比較，可知在事件發生的二十餘年後，沈志亮的原型已帶上若干文學色彩，成為民間萬口相傳的傳奇式人物。

其它如潘飛聲《澳門雜詩》第五首：“田橫島上漢家兒，雙手揮戈事最悲。片碣誰題沈義士，不聞穿塚傍要離。”邱逢甲《澳門雜詩》第十二首：“誰報兇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要攜十斛葡萄酒，來酌秋原壯士魂。”楊應麟《鏡湖雜詠》第十首：“彝酋苛暴吏潛通，誰謂三軍勝匹夫？若憶當年沈義士，萬人爭看好頭顱。”語皆悲壯，對沈志亮充滿敬仰之情。其中潘飛聲詩原注：“澳督某橫暴。有沈米者，以鎌刀殺之馬下。後為某劣紳誘陷就殺。然沈墓前有人題曰：‘沈義士之墓。’”楊應麟詩原注：“道光季年，葡酋肆虐，民不聊生。左署遷避，大吏掛口。時有沈公阿米，刃殺葡酋，赴官自首，從容就戮。都人義之，至今歲時奉祀如故。”皆足以傳之後世，以成信史。

咸豐四年（1854）六月，廣東天地會首領陳開起義，佔領佛山。李文茂、陳顯良、甘先等響應。起義軍頭裹紅巾，世稱紅巾軍。迅速佔領東莞、增城、順德、從化、花縣、清遠、英德、三水、肇慶等州縣，並兵分三路圍攻廣州，與兩廣總督葉銘琛率領的清軍展開激戰，直至五年（1855）春始撤離廣州外圍，轉戰廣西。廣州及近郊近縣居民，紛紛逃往澳門及香港。

澳門又一次成為粵中居民避亂的桃源。譚瑩《澳門人饋青洲蟹》下半：“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所詠正是當時實情。蔡雲緬因紅巾軍之役，從順德避地香山。其《夜話聽潮閣贈譚恕傳茂才並送之澳門》句云：“月落寒潮湧，更闌話未央。波濤翻內地，遭際在他鄉。”又有《喜家由澳門至鐵城》：“披榛斬棘繞行程，路出蠻夷鼓角鳴。尚得生存天有幸，不須相見淚頻傾。”可見其時廣州郊縣居民以澳門為避地，或取道澳門前往未有兵災之地暫避者甚衆。

在隨之而至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於咸豐六年（1856）借口“亞羅號”事件進犯廣州，被省城軍民迫退，但廣州十三行在衝突中燬於大火。七年（1857），英法組成聯軍，攻陷廣州，強佔廣州達四年之久。原在廣州十三行經營中西貿易的易瀾光因而避地澳門，其《澳門秋夜》句云：“意氣當年重行藏，此日蹉跎到海疆。……往事回頭皆是夢，癡心猶欲續黃梁。”詩人曾在其間慘澹經營，身家所寄的十三行，已在英軍進攻廣州時化為灰燼。“往事回頭皆是夢”云云，大約與此不無關係。約作於同時的葉棲鸞《澳門有感》下半：“祇知市易來商旅，那識邊防失事權。一統山河今若此，淒涼滿目亦潸然。”其時粵中經英法聯軍之役，省城未復，山河殘破，詩人潸然涕下，非獨為澳門也。

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戊戌變法，為時僅百日，便遭到掌握軍政大權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堅決反對而失敗。支持變法的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害，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在六君子被殺害後，維新派人士曾在澳門蓮峰寺舉行追悼會。劉翰棻《蓮峰寺追悼戊戌政變殉難六烈士》：“慟哭六烈士，忠君弗顧家。